

法经济学在中国:引入与本土化

魏建 宁静波

内容提要:法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法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现代法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初法经济学的概念引入中国,此后法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引入与兴起、兴盛与本土化两大阶段。法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法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的推动,在不同阶段,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对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对本土化议题的共同关注下,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对本土化问题的实证分析中不断地得到完善,并正在逐步走向分析范式的本土化。中国法经济学在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对法经济学整个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将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法经济学、本土化、实证分析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19.04.02

一、引言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界或法学界,法经济学已不是什么新鲜领域。经历过懵懂与排斥、流行与追捧、沉静和低调,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日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中国特色。自法经济学的概念引入中国,而今已近40年时间。值此中国对法治与经济予以前所未有之关注的新时期,回望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梳理中国法经济学发展脉络与研究成果,对发挥法经济学在未来促进中国法治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查阅知网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中国法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①使用主题“经济分析”,加上摘要搜索“法经济学”,搜索到1983-2018年共1413篇核心及CSSCI来源期刊文章。^②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2004年之后呈现出快速的上升趋势,2010年之后进入一个较为平稳的发展期。这与法经济学研究的其他一些表现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比如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鉴于此,本文将在之后的论述中,大致将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分为引入与兴起阶段(1983-2004)、兴盛与本土化阶段(2005-至今)。

收稿日期:2019-06-04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魏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宁静波(通讯作者),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 目前,知网可以搜索到的最早的文献是1983年第2期《现代法学》杂志上发表的种明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

② 诚然,从1983年至今,可以被列入法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文章不止这么多。囿于搜索口径的不同,所得出的成果数量总数有差异。但在不同口径下,分年度去看,发刊的数量发展趋势大致趋同。2000年后文章数量不断增加,2010年之后呈现曲折上升。本文选取部分文章(核心及CSSCI来源期刊文章)来进行一种描述,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学界主流的法经济学研究趋势。在法经济学研究的“流行”时期,作者更喜欢将“法经济学分析或经济学分析”彰显于主题之上,以体现研究视角的新颖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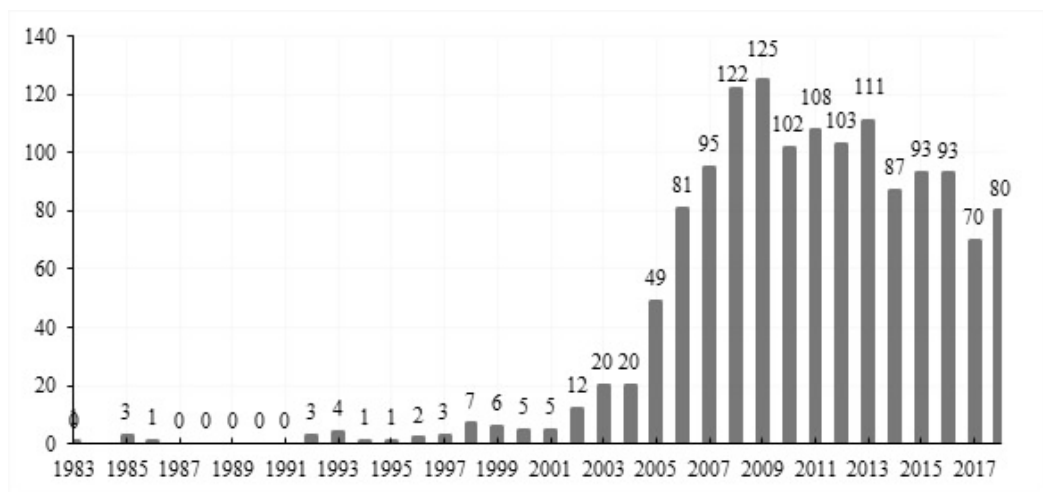


图1 1983年-2018年核心与CSSCI期刊中法经济学主题文章数量

二、法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概述

(一) 现代法经济学的萌发与兴起(20世纪30-60年代)

按照广义的法经济学的概念,可以将法经济学的起源追溯久远。^①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法经济学被普遍认为产生于美国。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C. Simons)和艾瑞·迪莱克特(Aaron Director)的加盟,不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带去了关于公共政策、反垄断法的全新理论视角,也成就了日后芝加哥大学“法经济学出生地(birthplace)”的美誉。^②现代法经济学开始萌芽。20世纪40-50年代,微观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假说”已经形成,学者们借鉴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引致出法律经济分析的一般假设,开始对受管制的行业、反垄断和税收等问题进行研究(Cooter,2011)。

1960年,罗纳德·科斯发表了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该文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又是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文中科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将法律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为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随后,更多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沿着科斯的道路,以“科斯定理”为基础,投入到法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现代法经济学正式兴起。

60年代,贝克尔、卡拉布雷西、科斯、德姆塞茨、兰德斯等学者一系列的研究向学界展示了经济学是如何在法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大展拳脚的。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与经济有关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比如税法、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等,而且逐步扩展到有关的人类行为研究上,比如婚姻家庭法、侵权事故法等被认为与经济学相去甚远的领域。这种与生俱来的理论扩展能力,使得法经济学在至今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几乎渗透到了法学领域的每寸疆土。

在法经济学发展初期,研究者主要是一些经济学家,所以并不存有关法学研究中部门法的清晰界

^① 魏建:《当代西方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认为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亚当·斯密、边沁、黑格尔等人。

^② 西蒙斯到芝大法学院讲授“经济分析与公共政策”课程,之后迪莱克特讲授“反托拉斯法”,并于1958年创办了“法与经济学杂志”,为法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限,学者时常跨领域、多面向进行研究。比如,贝克尔研究的是种族歧视和刑法;科斯研究的是侵权法和通讯管制(Posner & Becker, 2014)。然而,从分析方法的角度看,虽然法经济学已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引入到法学传统的规范分析当中,但学者们的早期研究还大都是一种理论阐释,实证研究的成果可谓凤毛麟角。^①

(二) 现代法经济学的成长与繁荣(20 世纪 70-9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以沙威尔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对法律现象进行分析。数学分析的运用要求从事法经济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习背景。在此背景下,法经济学的学理分析(academic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和法律实践(practice of law)日渐分离(Posner & Becker, 2014)。很多法学学者或律师因为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训练,而难以与经济学家们进行合作。从而,试图进行法律经济分析的研究者各行其道,开始把经济分析运用到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这一态势虽然推动了法经济学在各部门法领域的发展,却无法把法经济分析理论进行整体推进(Posner & Becker, 2014)。不过,这些研究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各个法学专业的多元化、纵深发展。同时,法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跨国的、国际性法律的研究,特别是一些国别间的实证比较分析。经济学对精确的数学语言的推崇,也推动法经济学的分析向实证的、更广泛的范围扩展。

这一时期,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地扩展。尤其是波斯纳 1972 年出版了鸿篇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这本教科书兼专著首次全面地勾勒出法经济学分析的蓝图,对之后的法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八十年代的法经济学研究乘风破浪,空前繁荣,不断填补了很多研究空白。同时法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形式化、公式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基于大量的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开始盛行,并越来越受到推崇。1987 年,考特和尤伦(Cooter & Ulen)出版了他们的法经济学教材,里面包含了很多简单、清晰的公式和模型,同时期出版的波林斯基(Polinsky)的法经济学教科书则更多地采用了数字例证的形式。沙威尔(Shavell)在其著作《事故法经济分析》中整合了事故法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波斯纳和他的合作者兰德斯,也采用当时的数据,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侵权法的法律分析当中。其他学者的著作有麦乐怡的《法和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克勒曼的《法和经济学》等(闫云峰, 2008)。

自 90 年代起,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又涌现出侧重研究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凯斯·孙斯坦和以合作的非法律机制(non-legal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为研究主题的埃里克·波斯纳等中青年法经济学家(冯玉军, 2014)。1998 年四位学者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 Vishny(以下简称 LLSV)发表《法律和金融》(Law and Finance)一文,引发了一波法律金融学的浪潮。他们比较研究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效率、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金融市场的支持与保护,开辟和形成了法与金融理论。

(三) 现代法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21 世纪)

2002 年,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 Kahneman)和维农·史密斯(V. Smith)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动了行为法经济学的兴起。在这之前,托马斯·尤伦(1997)在《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一文中就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批评,特别是 Jolls, Sunstein & Thaler (1998)《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行为法经济学”开始崛起,由此开启了法经济学领域的“行为革命”(李树, 2008)。

这一时期,美国法经济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有着长足的进展。通过对 2010-2015 年间美国法经济学会的会员数、提交论文数量、论文主题进行分析看出,美国法经济学会的注册会员数逐年增加,与会人员提交的论文数量也是成上升趋势(见图 2)。美国法经济学研究内容日趋广泛。具体来

①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献,包括 1960 年科斯的“Social Cost”;1962 年德姆塞茨的“Property Rights”;1965 年曼尼的“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1968 年贝克尔的“Crime and Punishment”等鲜见公式化、模型化的分析。

看,主要集中在企业与公司、证券与金融、法院与诉讼行为、行政与管制、反垄断法、税收与财政、合同、侵权等领域。除此之外,知识产权、健康、环保、行为(实验)经济学等也是学者较为关注的议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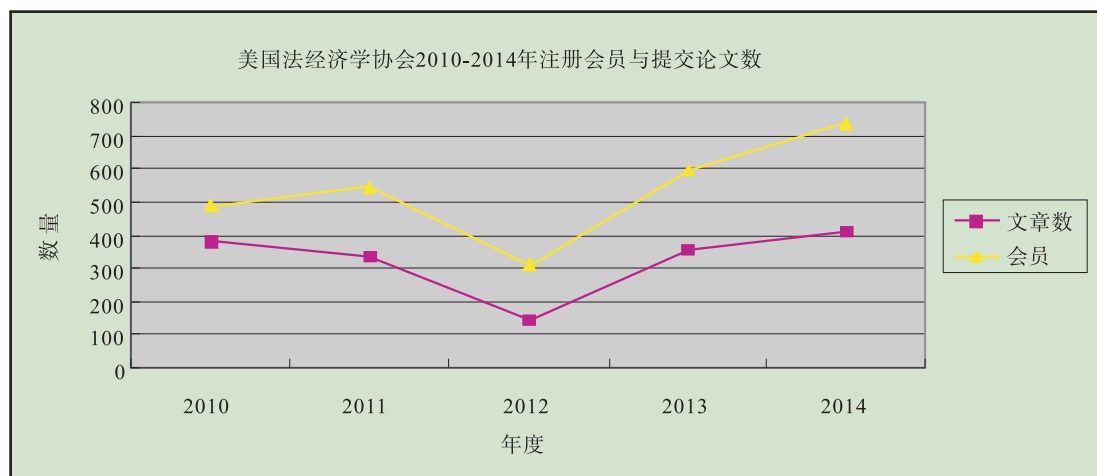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法经济学协会 2010-2014 年注册会员与提交论文数

近些年的美国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传统的微观视角的分析扩展到宏观视角的研究,法律与宏观经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备受瞩目。另外,法经济学者将对单一的法律与经济之间关系研究,扩展到法律、文化与经济,法律、地理与经济之间的多元关系研究,研究方法亦日臻多元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2013年以来,科斯(Ronald H. Coase)、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贝克尔(Gary S. Becker)、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法经济学巨擘相继离世,曾让人慨叹法经济学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然而,纵观整个世界,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法律体系、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参与到法经济学的研究中,新的理论、方法不断涌现,法经济学依然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与兴起(1983-2004)

20世纪80年代,法经济学在美国繁荣发展的阶段,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形态的变革,同时也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变革的核心是法律。于是,法律与经济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核心因素。市场经济结构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形成?同时,建设什么样的法律体系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实践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具挑战性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②

法学研究领域,在经历过建国初期对苏联法学研究模式盲目照搬照抄和文革期间对法治的打压之后,学者们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的理论法学体系。他们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理论法学建立在学习古今中外进步的、科学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之上,使之既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① 作者根据美国法经济学年会网站 2010-2014 年的提交的论文分类整理得出。

② 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在评论李曙光教授《转型法律学》一书时提到,“适应市场经济的法治是什么样的?我们目前的制度与此相比存在着哪些缺陷?市场经济应如何法治化?也就是对实然制度的分析、对实然制度的思考以及对法治之途的探索。这些问题被改革的实践提到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急需学术上和理论上的回答。”参见江平:《经济学的法律眼镜》,法人,2004年第5期。

的问题,又能解答人类所提出的一切有关法的理论问题(张文显和马新福,1986)。按照应用法学和理论法学的法学学科分类,法哲学、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通常属于当时西方理论法学的研究范畴。在此背景下,理论法学领域的学者们最早开始关注此时正在美国蓬勃发展的西方法经济学。

在同时期的经济学领域,学界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课题。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又是学术理论问题,历史没有提供现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诠释,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借鉴其分析方法,但不能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陈岱孙,1981)。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热烈探讨^①,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为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姚子范(1981)通过与宏微观经济学的对比分析,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关注视野逐渐打开,而作为与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法经济学也开始逐步受到关注。

(一) 法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与起源的追溯

1. 对“法经济学”概念与内涵的理解

什么是“法经济学”?对于这样一个牵扯法学与经济学两大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概念,由于其产生背景、理论方法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国外学者至今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界定。Law and Economics(法经济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pproach to Law、Economics of Law、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等称谓,广泛存在(周林彬,2008)。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了学者对法经济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和侧重。这种差异受学者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学科背景、问题性质、研究视角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而法经济学的概念在被引入中国时不仅体现出国外研究原有的这种差异,同时国内学者对法经济学含义的不同解读也受到国内不同时期研究环境的影响,也反映出一定的本土化特色。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有关论述,种明钊(1983)认为法经济学是介于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是研究物质生产关系同法的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倪继信和任祖耀(1983)认为法经济学是研究法律与经济内在关系规律的科学,它包含了法律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规律、法律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规律、法律的发展变化决定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等具体内涵。种明钊和顾培东(1985)在梳理国外学者关于法经济学的研究后,认为西方法经济学的任务是分析具体法规所产生的经济效用,预测法律的未来经济效果,以便为立法和执法提供参考,中国应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建立马克思的法经济学,研究法与经济互动作用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朱力宇(1990)使用的是“法律的经济分析”一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的法律经济分析理论的奠基者,其理论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和政治经济学中。张乃根(1992)指出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是根本不同的。纵观80年代的许多文献,学者将法经济学区分为马克思主义的法经济学与西方或资产阶级的法经济学,认为前者的核心是指法律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中介并由生产力最终决定的,后者则是指法律或制度是以资源配置为目的,以效用来评价法律(朱力宇,1990)。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法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法经济学。这一时期对法经济学内涵的解读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对法经济学的更为宽泛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视作法经济学的一次本土化尝试(殷继国,2010)。

易宪容(1996)在介绍法经济学时,指法经济学的英文为 Law and Economics,美国著名的法经济学

^①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是中国经济学界建国以来到80年代初最为热议的领域之一。参见王圣学: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3月。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法律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因而,虽然当时并没有论及法律的问题,但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的探讨,为学界对法律的关注以及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学科的建立做了很好的铺垫。

家波斯纳称之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它是用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魏建(2001)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认为法经济学的内涵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法经济学是指对社会中法律现象和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述就属于广义的法经济学;而狭义的法经济学就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形成的现代法经济学,他们研究局限于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研究法律体系下行为人的反映及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钱弘道(2002)认为科斯以来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极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依照前文所述,中国近些年的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法经济学的引入与本土化,主要指的是现代法经济学或者说科斯之后的法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对于法经济学的基本内涵的理解已较为明晰,为进一步的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总结与提炼奠定了基础。

2. 对法经济学的历史起源、理论演变的研究

易宪容(1996)指出从广义的法经济学看,其历史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古罗马的贾斯提尼安《民法集成》中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就是经济分析”。在中世纪经院哲学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经济学家莫利纳用价值、效用、价格等经济学的概念讨论了有关的公共政策的各种问题。

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对法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经济分析(朱力宇,1991)。亚当·斯密在他的《论法律》及《国富论》中就运用了经济分析来阐明法律与政府的发展过程,而意大利的贝卡利亚1764年出版了《论犯罪与刑罚》,提出了“刑罚与犯罪的均衡性”的原则,对现代法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易宪容,1996;魏建,200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法律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分析(朱力宇,1991)。马克思的这些成果尽管没有被后来的研究所全部吸收,但其法律制度非自为性和工具性的观念经过马克斯·韦伯的发展成为“法律工具主义”,其法律制度的利益性命题,经过批判主义法学的阐发而对当代的法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魏建,2001)。

19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后,梅因、黑格尔、边沁等思想家都对法律问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经济分析,并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被认为是西方法经济学分析理论的发端(朱力宇,1991)。当然,学者也都普遍认识到,上述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与现代法经济学还不是一回事。

易宪容(1996)指出在美国对法律规则进行广泛的经济分析肇端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的进步主义运行时代。赵凤梅和李军(2008)把法经济学的出现归结为三个因素,即市场失灵、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公共政策、“法律现实主义”思潮。20世纪初德国的历史学派与凡勃伦以及他的学生康芒斯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推动了法经济学的第一次浪潮,他们从其实证的、历史的研究中,对法律制度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魏建,2001)。

为区别于之前的法经济学,学者称与新制度经济学同步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法经济学为“现代法经济学”(魏建,2008)。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和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斯在芝加哥法学院开设《经济分析与公共政策》,揭开了法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篇章(张乃根,1992)。史晋川(2001)认为法律经济学运动融合在整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运动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运动中,呈现出一种“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所谓“一体”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及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两翼”是指詹姆士·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非市场行为经济学研究。

魏建(2001、2008)基于伊詹恩·麦卡伊(Ejan Mackaay)的分析,对被称为第二次浪潮的20世纪

50年代末的法经济学,从发轫期、范式孕育期(1958-1973)、范式接受期(1973-1980)、范式质疑期(1976-1983)到成熟期(1983-)进行了详细描述。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法经济学者将法经济学的起源、发展、与法学和经济学理论派别的关系(传承与冲突)进行了较为完善的梳理,清晰地展现了现代法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国内学者理解和借鉴法经济学理论做了良好的铺垫。^①

(二)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提炼与完善

范式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用于描述一个领域内研究者们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解决该领域研究什么和用什么方法研究的问题(魏建,2001)。学者们在法经济学概念引入中国的头二十多年里,对法经济学相关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与评价。

黄少安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产权理论的学者,他的《产权经济学导论》(1995)从哲学基础和理论架构等方法论层面,对理性选择、科斯定理、产权结构和制度演化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分析。沈宗灵(1990)对波斯纳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进行了解析。张建伟(2000)认为新法律经济学应以“合作秩序”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其理论框架。李胜兰(1996)和冯玉军(2001、2004)对于法经济学研究的理性人等基本假设、成本收益等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和科斯定理等基本定理进行了研究,并对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进行了梳理,包括法律成本效益理论、法律市场理论、法律供求理论和法律均衡理论。钱弘道(2003)通过对新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的梳理,对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

魏建(1998、1999、2001、2002)系统、全面地解析了现代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借鉴库恩的范式理论,他认为早期的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立场对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阐释,没有成为普遍接受的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而现代法经济学则具备了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共同构成的一个学科领域分析范式:即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是法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范式;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学范式;谈判理论为核心的法经济学构造范式;而法律的博弈分析依然坚持个人理性最大化假设,是对谈判理论的发展,甚至构成了替代。

对于异军突起的行为法经济学,学者们也给予了很多关注。魏建(2003)、周林彬(2004)等学者介绍了行为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分析方法,同时认为,虽然行为经济学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构成了挑战,但是并不能替代理性选择理论,只是在优化理性选择模型的同时,进一步平衡了法律经济学中理论假设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它只是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

1983至2004年间,学者们对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进行了清晰而又全面的介绍,并提炼出了法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为法经济学在本土化的应用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解析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时,并不是简单地将外国的研究进行整合,而是基于这些理论的逻辑本身对其进行了评价,发现其缺陷并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径。^② 这些研究为法经济学范式的本土化做出重要贡献。

(三) 代表性法经济学著作的引入

随着学界对法经济学的关注不断深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法经济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引入中国。

① 还有大量文献对法经济学的起源、发展进行了分析。参见赵和旭: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原理简述,江淮论坛,1990年第6期;蒋兆康、田培炎:作为一种法哲学的法律经济学——它的历史、基础和方法,中外法学,1992年第1期;顾培东: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兼评西方法律经济学,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郁光华:法律的经济分析——现代北美法学流派之一,法学评论,1994年第5期;王育才:法律经济学初探,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等。

② 如单伟建(1989)、黄少安(1996)对交易成本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参见黄少安: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缺陷分析(上)、(下),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4期、第5期。

90年代,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的当代经济学译库、新制度经济学译丛,里面包含了很多经典的法经济学理论著作,比如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等书。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经济学译丛系列;中国政法大学的波斯纳译丛系列、美国法律文库系列、雅理译丛系列,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外国法律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法律出版社等都出版过许多经典的法经济学译作。

从数量上看,被翻译作品数量最多的为法经济学集大成者——理查德·波斯纳教授。波斯纳著述丰富,有所谓“一个人的智库”之称,他的文章常列美国法学界高引榜之上,对美国的法学研究有着历史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93年著名法学家苏力先生开始翻译他的著作至今,有二十多部他的个人独著或合著作品被翻译成中文。^①

同时,还有《法律的博弈分析》、《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法和经济学的未来》等几十部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从1986年第一部法经济学译作问世到2019年初大约有60部法经济学专著被引入到中国。^②除了学术著作,学者们还翻译了很多法经济学教材,其中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编写的《法和经济学》教材,从1994年被翻译成中文,到2012年的第六版,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法经济学教科书。这些经典法经济学的译作,为中国学者了解国外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及理论前沿提供了更为直观的渠道。

(四) 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应用

在对法经济学基本分析范式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将法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部门法领域的法经济学分析;二是具体案例的法经济学分析。

1. 部门法的经济学分析

在部门法领域,主要是法学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不同的法律进行了效率分析。从整体看,此时期部门法的法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法、商法、合同法等与经济学更为密切的领域,以及刑事法律等法经济学理论比较成熟的领域。

张守文(1992)对经济法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周林彬(1995)认为在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方面,民法是市场的互补形式,商法是市场的替代形式,经济法是市场的补充形式。李胜兰等(1997)分析了中国经济法律的成本构成和影响因素,并从经济法律的立法方针、结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降低经济法律成本、完善市场经济法律运行机制的思路和措施。刘大洪(1998、1999)对反垄断法及经济法进行了效益—成本分析。王传丽(1999)运用法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反倾销立法的本质和其有限制的合理性,并为完善我国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提出建议。

朱慧和史晋川(2001)基于科斯的思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重新阐述知识产权保护的悖论。谢晓尧和黄胜英(2001)对格式条款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钱弘道(2003)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手段进

① 苏力教授一人翻译了至少七本波斯纳的著作,包括《法理学问题》、《正义/司法的经济学》、《法官如何思考》、《性与理性》、《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各行其是(法学与司法)》、《并非自杀契约》等。蒋兆康、武欣、孙秋宁、徐昕、凌斌、李国庆、周云、沈明、邓海平、李晟、郝倩、黄韬、金海军等学者分别翻译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理论的前沿》、《反托拉斯法(第2版)》、《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法律实用主义与民主》、《法律与文学》、《衰老与老龄》、《论剽窃》、《资本主义的失败:08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及法学理论》、《卡多佐:声望的研究》以及《法官如何行为:理性选择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李·爱泼斯坦、威廉·M.兰德斯、波斯纳合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威廉·M.兰德斯、波斯纳合著)、《侵权法的经济结构》(威廉·M.兰德斯、波斯纳合著)等著作。

② 史晋川、吴晓露认为1986年张蔚青译的《法律和经济》是第一本引入我国的法经济学专著。参见:史晋川、吴晓露:法经济学:法学和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发展,财经研究,2016年第10期。

行了分析,认为解决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利用税收控制污染与其他管制相比,有很大的优越性。董雪兵和朱慧(2004)对计算机版权制度与专利保护制度的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卢建平和苗森(1997)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刑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陈正云(1999)对刑法进行了经济分析。桑本谦(2003)对非法证据的采用还是排除进行了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

2. 具体案例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没有部门法的界分,更多地是由现实的或历史的具体问题出发去研究某一法律制度。国内法经济学对具体案例分析的最早尝试是史晋川(1996),他对计算机软件盗窃案中厂商收益损失确定和计算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李振宇和黄少安(2002)对农民烧秸秆的事例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史晋川和吴晓露(2002)以“三菱帕杰罗”案为例,研究了产品缺陷标准的内生问题。张维迎(2002)针对一个银行取到假币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信誉机制是一种比法律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通过对合同纠纷中原被告的胜诉情况、违约原因及其裁决等方面的分析,解释了存在于司法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效应,发现故意违约并引发诉讼更主要是人们的策略性选择。应飞虎(2002)对不年检公司执照被吊销问题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黄少安和宫明波(2002)以中国首次铁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为例对价格听证会进行了效率分析。黄少安和李振宇(2002)对悬赏广告对主体间合作剩余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维迎和邓峰(2003)通过对中国古代连坐和保甲等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认为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法律制度应该随信息成本的变化而变化。李增刚(2003)从协议合作与避免国际公地悲剧视角研究了南极问题。

(五) 作为法学或经济学分支的法经济学:排斥与试探

纵览这一时期法经济学的研究状态,中国法经济学是作为法学或经济学的分支而存在的,在各自的学科内部还没得到广泛认可,甚至被排斥;而法学学者与经济学者的研究各自独立,尚未交融。

在法学界,法经济学当时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是一种分析工具。法学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并没有和经济学界产生互动,而由于缺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专业训练,法学领域的法经济学分析显得简单而又生硬,经常出现“两张皮”的现象,被学者们后来称为“幼稚法经济学”;同时,作为一种效率分析的工具,法经济学被主流传统的法学学者排斥,法经济学的研究难登“大雅之堂”。^①在经济学界,由于自身的经济学专业优势,经济学家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运用比较自如;但由于法学理论知识的欠缺,经常被诟病基本概念混淆不清,量化方法以偏概全。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法经济学的起源、内涵、理论基础、基本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数量相对不多,却不乏精品,尤其是2002年左右,《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等顶级期刊发表多篇法经济学相关的优秀成果。^②

整体来看,1983至2004年间的研究偏重于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实证(量化)研究相对较少。在早期的引入与介绍中,理论法学领域的学者做了更多的工作,部门法的法经济学研究相对较弱,甚至有些部门法的经济分析还尚未开始。在分析范式的提炼及法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解释和推广中,经济学学者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经济学界的研究以规范分析为

① 这一时期法经济学的研究的文章很难在法学专业期刊发表,主要发表在一些综合类期刊上,除了少数的《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学》、《法律科学》等杂志,大多数法学核心期刊都难见法经济学的研究的文章。同时,由于法学学者的文章理论方法比较简单,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也很难发表。

② 随着法经济学的兴起,理论界对其的关注度增强,其中一个体现就是顶级期刊对法经济学的认可。2002年,魏建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张维迎和柯荣住发表了《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2003年,张维迎和邓峰发表了《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同时,《经济研究》也发表了《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张维迎,2002)、《产品责任制度建立的经济学分析——对“三菱帕杰罗事件”的思考》(史晋川、吴晓露,2002)、《论两主体情形下合作剩余的分配——以悬赏广告为例》(黄少安、宫明波,2003)等文章。钱弘道在2002、2004年在《法学研究》发表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法律的经济分析工具》两篇文章。

主,量化研究较少。

虽然前期的法经济学研究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但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多,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了解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机构充当起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桥梁,促使双方不断走向融合。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2001)、浙江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2001)、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2002)、中山大学法经济学研究中心(2003)、山东大学法经济学研究所等法经济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集聚起法经济学的研究资源。^①更重要的是,由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自2001年连续联合举办的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以及其他一些法经济学学术会议,有力促进了法学界与经济学界法经济学研究的沟通与交流,为两大学科的交融和中国法经济学的真正独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世纪中国法经济学的研究在法学与经济学彼此试探的过程中逐渐兴盛起来。

四、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与本土化(2005-2018)

2004年以后,随着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成熟,尤其是随着具有法学和经济学双重学术背景的海归和本土年轻学者的成长,学界逐渐掀起了一场法经济学研究的热潮。核心以上的期刊发文量有了显著的提升,2005年较2004年翻了一番,之后逐年呈递进式快速增长之势。^②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少量的对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法律变革中的现实问题,逐渐将西方的法经济学发展成中国的法经济学。关于什么是本土化?本文借鉴社会学家谢宇(2018)的观点,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范式本土化三个层次进行观察。

(一) 议题的本土化:社会转型中的共同关注

所谓议题的本土化,是指研究对象范畴的本土化,是学者运用法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特有的法律或社会问题,反映的是对当时中国各个领域中问题和现象的思考。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法学与经济学界的共同关注。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法治环境的建立,中国的发展使得经济与法治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共同的社会背景让法学与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找到了越来越多共同的话题,双方的理解愈加深入,法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主题逐步融合。

1. 法治与经济发展

魏建(2010)认为中国通过对产权的选择性保护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Long(2010)从权利假说的角度出发,运用世界银行的企业级数据来研究中国的法治发展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认为法治将取代关系成为最有效率的治理方式。陈刚和李树(2013)利用法官异地交流实验研究了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的关系等。余明桂等(2013)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国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产权保护风险。龙小宁和黄小勇(2016)对公平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影响我国企业公平竞争官员清廉度与政府规制繁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2. 法治与社会转型

桑本谦(2006)对山东农村地区关于修建房屋、婚丧嫁娶和借贷的互助合作规范进行了研究。徐昕(2006)在法院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法官、证人、律师、当事人的访谈,对我国司法转型过程中的证

① 在此之后,法经济学的研究机构、研究团队及一些专业协会等也随着法经济学的兴盛,逐步建立起来,有关名称及建立时间,参考黄立君:《中国法经济学发展概览》,《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② 虽然根据本文开头部分的统计图表显示,法经济学文章在核心以上期刊的发文量在2010年之后进入一个缓慢曲折增长,但是根据其他统计口径的汇总,包括法律的实证分析、裁判文书的研究等,法经济学领域的文章一直呈上升之势。发生这种偏差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文献统计口径差异和技术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法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学者对经济分析的理解也更为透彻,在题目的设计上采用了更为精准和新颖的表达,而不仅是简单的经济分析或法经济分析来进行概括。

人作用进行了研究。桑本谦(2007)以通奸和黄色短信的法律控制为例,认为受国家支付能力的限制,法律控制的合理边界应当确定在边际控制收益与边际控制成本恰好相等的位置上。黄文平(2007)鉴于对1952-2003年间中国法院诉讼案与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诸变量之间实证关系的计量检验,认为现代中国的法治转型,是一个生发于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由传统“人治”型模式向现代“法治”型模式转变的演化过程。桑本谦(2014)认为未经公证的赠与承诺之所以不会被法院强制执行,在程序上,是因为证据匮乏而导致法律实施成本过高;在实体上,是因为受诺人承诺的信任超出了合理的限度。

3.法治与社会治理

冯玉军(1998)、艾佳慧(2007)对烟花爆竹的禁放问题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魏建和王安(2012)运用威慑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解释了在交通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不断地提高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惩处水平确实发挥了良好的威慑作用。唐清利和何真(2016)通过对日常纠纷的博弈分析发现,当特定组织内部的有执法权的一方进行报复性违约以惩罚相对人的投机行为时,会产生一个制度外的公私权模糊领域和特殊的矛盾纠纷,传统社会矛盾管理机制效率低下。

魏建和宋艳锴(2006)阐述了刑罚威慑的发展历程。史晋川和吴兴杰(2009)对中国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刑罚威慑力、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犯罪决策具有重要影响。陈刚等(2009)利用中国31个省级单位的两期混合数据发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导致中国犯罪率急剧上升的原因。陈屹立(2012)认为严打政策对暴力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威慑效应,而且还存在着后续威慑效应。但对财产犯罪和总犯罪的威慑效应并不明显,这和严打的重点打击对象以及暴力犯罪的占比是有关系的。黄少安和陈屹立(2008)基于中国1978-2005的实证研究对影响犯罪率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

4.法治与司法改革

艾佳慧(2006)解释了中国法官为什么会经常流动,她认为中国的法官效用最大化在于收入与地位的提升,而不断的升迁调动会导致法官缺少专业知识的积累,更加依赖上级领导,进而会加重法院管理的行政化。王雷等人(2007)在法官最大化个人效用的选择行为基础上,分析了对中国法官裁判的影响因素,进而得出社会所获得的公正执法水平。

黄韬(2012)认为不完备法律学说阐释了证券市场上国家权力最优配置的观点并对“司法弱势”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宁静波(2013)对基层法院的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量化研究,揭示了当时法院“案多人少”背后的真实原因。陈若英(2014)对法院和市场规制部门的对比,指出提升法院机构竞争力及司法改革日后的建议。龙小宁和王俊(2016)通过对法院系统的历史与实证研究,诠释了法院发展与法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延龙、龙小宁和孟磊(2019)使用行政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巡回法庭的设立有利于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王俊峰(2014)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民事诉讼率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城市化以及制度变迁的相关性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因素影响民事诉讼率的具体机制。艾佳慧(2017)以诉讼当事人和上诉审法官之间的动态博弈以及我国独有的组织、审判管理视角,对第一审程序的诉权保障功能及进一步构建上诉甄别和筛选机制进行了研究。

5.法治与市场规制

黄少安和赵海怡(2005)对破产企业劳动债权是否应当优先清偿进行了分析。魏建、褚红丽(2007)从股东创业成本最小化与债权人利益保护双重价值的权衡出发分析了中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问题。冯玉军和方鹏(2012)就企业、工人双方基于《劳动合同法》框架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从博弈论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双重角度论证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困难的必然性以及原因。

李睿鉴和陈若英(2012)结合2011年首例对赌协议无效案,认为在对赌协议的合法性辨析方面需引入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视角,对赌协议帮助投融资双方应对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估值差异并解决代理人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

黄立君和杨芳(2012)通过腾讯公司和奇虎360恶意竞争的案例,对监管失灵与法律缺失情境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分析。李胜兰和何朝丹(2012)论述了法律与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在中国的转轨经济阶段法律与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治理层面的互动关系。史晋川等(2014)对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分析认为适当降低食品产业中与安全性能不直接相关的最低质量标准,同时提高惩罚力度与加强政府监管创新,可能是缓解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更好选择。史晋川等(2015)对产品责任和声誉积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侵权法律制度可以提高厂商非正式声誉机制的执行效率。

6.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苗妙和魏建(2014)考察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中处理和调解这两种不同纠纷解决方式对企业创新激励的不同影响,从企业创新激励的角度为知识产权纠纷的行政执法偏好选择提供了新的解释。王俊和龙小宁(2016)基于福建省德化县版权本地免费登记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法研究了版权保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龙小宁等(2018)从立法制规保护、司法保护、行政保护三个维度构造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并与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匹配,定量测算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龙小宁和林菡馨(2018)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培育专利保险市场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

7. 土地与住房问题

冯玉军(2007)、李长健等(2008)通过对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中的权力、权利和利益问题进行博弈论和模式化的分析,探讨了现行拆迁制度的利弊得失。朱宪辰和李平(2005)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城镇住宅小区,共享资源业主自治合作均衡的存在性,以此分析了当时出台的城镇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法规的必要性。朱宪辰和高岳(2007)针对中国物权法变迁过程中的条款矛盾和蕴藏的利益冲突进行了研究。黄少安和刘明宇(2008)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农地产权安排的内在权利冲突及其在经济上的后果进行了分析,主要探讨农地承包制对农业投资水平和技术选择的影响。魏建(2010)研究了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张广辉(2012)研究了农地征收中的产权问题。

从中国的法治与经济增长、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议题,到严打、“禁放”、食品安全、土地流转、劳动合同、农民权益、企业创新、人口流动与犯罪、知识产权保护、司法改革等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生的一些热点问题,中国问题成为法经济学学者研究的重点,相似的本土化议题拉近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界限,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共同的话语环境。

(二) 应用的本土化: 实证量化分析的共同认可

应用的本土化是指将法经济学理论通过创新、改良应用到中国一般性问题的研究中。在此时期,主要的体现在学者将法学与经济学理论相互结合,实证量化方法的广泛运用上。

1. 法学实证研究推进下的法经济学本土化

从20世纪80年代法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到21世纪初,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定量的实证分析问题还比较缺乏。^①自2005年以后,这一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实证分析甚至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流分析方法。这一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法学领域实证研究的推动。

实证研究作为社会科学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田野调查到数据统计、计量分析,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在中国,法学的实证分析早先并不受认可,但随着传统法解释学及社科法学研究方法在解决某些问题上的能力不足日益彰显,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②虽然法学界对于向何种研究方法转型尚没有形成统一论,但是多元化研究

① 中山大学周林彬教授曾经在2006年的法经济学论坛上以2004、2005年的与会文章为研究对象,对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参见史晋川、朱慧:法经济学在中国的新进展——第四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② 法解释学是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参见左卫民:法学实证研究的价值与未来发展,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

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的推行,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左卫民,2013)。之前在法学界比较流行的实证分析更多的是个案分析,不同于实证量化分析。个案分析虽然能够着眼于实践的问题,但很难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鉴于此,一些法学学者开始致力于推动基于现实数据的实证研究,并试图从简单的统计分析向回归分析、方差检验等计量分析努力。张永健和程金华(2018)对法律实证分析的内涵与社科法学实证分析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分析,展现了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近况。

北京大学的白建军、西南政法大学的左卫民等法学著名学者在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① 白建军(2006)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通过对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死罪”案例为样本,对死刑的运用进行了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之后,白建军(2010、2016、2017)又运用相关数据,对罪因、罪行、刑罚等问题、量刑预测、中国民众的刑罚偏好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较好地运用实证量化分析的同时,能与法解释学的分析有机结合,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国内顶级期刊上。

左卫民(2005)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经济分析,之后一直致力于司法改革和交叉学科的法律实证分析。在他的推动下,四川大学法学院自2016年开始举办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年会,围绕大数据、司法、部门法等进行实证研究的交流与探讨,联络了很多法经济学研究者,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法学实证分析的兴盛,吸引了很多年轻学者,特别是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投入其中。^② 他们在国内外受到过良好的法学教育及实证分析训练,为解决法经济学分析中的“两张皮”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

2. 司法裁判文书公开与法经济学的本土化

法经济学实证量化研究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数据的不可得性。特别是在司法制度相关的领域,很难获得公开的数据。而司法裁判文书承载着很多重要的法律与个体信息,能够很好地反映法律的运行对个体的激励作用。因而,对司法裁判文书、案例的分析一直受到学者的青睐。2014年以前,学者们只能通过最高法院公开的指导性案例或其他一些渠道公开的案件来进行分析。2014年,随着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在网络上的公开发布,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找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2014年之前,白建军(2005)刑法的量化实证分析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死罪”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审级制度可能比较有效地控制死刑立即执行的规模,而能否有效控制死刑本身的适用规模却值得怀疑。于立和冯博(2012)运用国外法经济学关于判例的法经济学分析视角,审视了最高人民法院首个指导性案例的作用。潘越等(2012)研究了专利权诉讼的提起、判决以及审理时长等诉讼细节对原被告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揭示了司法诉讼对原被告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龙小宁和王俊(2014)、Long & Wang(2015)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1985年以来的知识产权案例为研究样本,认为民事诉讼中原、被告与审理法院在行政区划上的位置关系对法院判决结果会产生影响,发现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方面的相关证据。

2014年之后,大量以法律裁判文书为基础的研究涌现出来。^④ 黄辉(2015)基于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从债权人保护功能的法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正当性。褚红丽和魏建(2016)通过对2014年中国法院公布的受贿罪一审判决文书进行分析,发现腐败金额越多,判刑时间

① 关于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参考陈柏峰:法律实证研究的兴起与分化,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他认为最早从事法律定量研究的是白建军教授,他从1990年代就开始对刑事法律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延续至今。

② 随着国家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大量的海归学者投入到法经济学的研究中,像在法经济学领域比较活跃上海交通大学的程金华、清华大学的何海波、北京大学的陈若英、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的张永健等年轻学者都毕业于世界知名大学。

③ 张永健关于法律实证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全面梳理法律实证量化研究的方法,不仅为入门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也展示了很多中国年轻学者运用法律实证研究的优秀成果,参见张永健:量化法律实证研究的因果革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④ 关于裁判文书的文章数量很多,囿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不再进行列举。

越长,但判刑增加的力度随着腐败金额的增加而减少,惩罚力度呈现出边际递减现象。2017年四川大学法学院左卫民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一书中大多数文章都是依据公开的裁判文书。田燕梅等(2018)对著作权案件中的原告起诉请求金额与法院的判决额之间进行了对比分析。魏建等(2019)对版权侵权案件中司法的弱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褚红丽等(2018)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的《职务级别、法律制度设计与腐败惩罚扭曲》,发现了我国腐败惩罚扭曲问题的背后原因,是首篇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的基于司法裁判文书统计数据量化分析的文章。^①褚红丽和魏建(2018)则主要实证分析了2015年刑法修改对腐败惩罚的影响。

在应用本土化方面,法学界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较而言,经济学界的推力则稍显逊色。这一方面归因于经济学者先天的技术优势,进步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可能源于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比较宽泛,法经济学研究经常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混同,从而很难辨析出经济学界对法经济学研究的一种专有推动力。

应用的本土化,不是简单的实证分析方法的运用,而是体现在青年学者对它的认可,这种认可为法经济学实证分析打下了坚实的智力基础。随着实证量化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基于裁判文书的研究的增多,挖掘出很多新问题,为我国的法律体系完善和司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 分析范式的本土化:中国经验的共同探索

范式的本土化是指结合本土的经济学理论和法学理论,对现有的法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创新,进而形成新的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范式本土化的根源在于中国和西方文化、法律等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性差异。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对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本土化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表现为对西方分析方式下议题、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及研究结论的反思,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及本土经济学、法学等理论的挖掘与传承。

苏力(2006)对“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展示了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审理案件的分析判断中实际隐含的强劲经济学逻辑及其普遍性。桑本谦(2008)接续了苏力对“海瑞定理”的解读,进一步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挖掘这些司法经验的经济学内涵。对中国历史司法经验的经济学解读,关注到了范式本土化的历史根源,不仅开拓了法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也为中国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完善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史晋川(2006)认为通过研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和混合经济理论体系的演变及其两个经济理论体系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清楚法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谱系中的位置,这一结论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进提供了经济学谱系的思考。魏建(2006)以网络游戏虚拟财产这样一种新型的财产作为分析对象提出了一个新的产权界定原则。魏建(2006)认为博弈分析提供的特定环境下主体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适合进行法律分析,博弈分析成为新的主流分析范式;“理性”概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精炼,形成“新理性选择理论”,并以此引导法经济学将向更加实证的方向发展。

李树(2008)通过对行为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以主流法经济学为“主流”和“主导”,以行为法经济学为“补充”和“完善”,将是未来法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艾佳慧(2013)认为来自域外的法律经济学理论不能有效回应和解释当代中国问题之际,正是中国学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造之时。鲍金红和郭广迪(2015)研究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之中,实际上先于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思想、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法经济学思想,这一点对全面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冉昊(2018)对财产法中法经济学采用的在纠纷发生后通过效率分析来重新确定权利顺位高下的“事前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我国财产法制的建设中,必须专注我们特殊的历史起点。周林彬

① 在基于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中,运用量化分析的还不是很多,而且主要发表在综合类期刊上。这篇文章的发表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基于裁判文书的量化分析得到了经济学界的认可。

和王睿(2018)对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特点、新趋势、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找寻法治与中国的中国经验。

在对中国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探索中,学者已开始关注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法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等很多重要问题,提出了中国法经济学发展的建议,甚至提出某些新的概念与理论,但尚未形成中国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四)作为交叉学科的法经济学:融合与发展

总结上文可以看出,学者们在研究议题的选取上更多地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法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上,研究成果更多地受到本土经济学、法学两大学科研究理论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法学实证研究的崛起与盛行,带动着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方法更为精深。范式的本土化则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传统、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同时,法学与经济学在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这种融合的动力既来自于中国发展的外部大环境,也来自于本学科发展的内部小环境。共同的研究问题,引发了共同的使命感,让法经济学学者有了共同的目标;分析方法的统一,让不同领域的学者有了共同的语言;海外教育背景人才与本土学者的联合,让法经济学的融合更具国际化水准。内外部动力推动着法经济学由幼稚走向成熟。现今的中国法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

在法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力量推动着这一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学术期刊的认同与支持。如前文所述,曾经的法经济研究很难得到专业期刊的认同。时至今日,这一状况已大大改观,随着法经济学研究水平和影响力的提高,学术期刊对法经济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除了《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三大刊”,《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法学》、《法商研究》、《法学论坛》等专业期刊也开始认可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很多综合类期刊,如《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为法经济学实证研究开辟专栏。这种认同一方面使得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得到广泛传播,扩大了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激励着年轻的学者不断深入、创新研究,勇攀高峰,向着世界顶级学术研究成果迈进。

五、中国法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未来

(一)中国法经济学的国际化

回顾中国法经济学的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概念的引入,到90年代的学习、模仿、尝试,再到21世纪对本国问题的关注与深入分析,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在本土化过程中日益强大。而作为法经济学的一部分,中国的法经济学在本土化的同时,也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回到中国,带来了很多国际前沿的理论、方法及资源平台,为中国的法经济学注入了国际化的力量。一直致力于法经济学研究推广的熊秉元以及当前在法经济学界比较活跃的龙小宁、陈若英、程金华、何海波、张永健、刘庄等学者均在国外名校受过系统的法经济学训练,他们的研究开阔了中国本土化研究的视野,也为国内学者引进了国际前沿的理论方法。^①同时,学者的回归也带来很多学术资源,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即为促进学者与学生的跨学科研究而设立,而2011年起开办的芝加哥大学法经济学暑期项目也为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前沿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宝贵机会。海归学者们使得中国法经济学与国际接轨,能够时刻追踪国际前沿。

^① 张永健对于量化法律实证分析方法的介绍对入门学者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参见张永健:量化法律实证研究的因果革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

另一方面,中国法经济学学者在国外期刊的发刊数量不断增多,国际学术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龙小宁(2010)在法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文,探讨了中国法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2015年又与王俊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Judicial local protectionism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IP cases”一文。Lin, Yu-Hsin, Chang, Yun-chien(2017)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发表了“Does mandating cumulative voting weake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刘庄(2018)通过实验研究说明了说理能够降低法官的道德偏见,发表在《Journal of Legal Studies》上。另外,《American Law & Economics Review》《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China Economic Review》等其他国际期刊上也可以看到中国法经济学学者的成果。^① 这些成果不仅反映了学者们先进的技术方法以及深厚的理论功底,也反映了法经济学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及研究成果质量的认可。同时,中国的很多期刊外文版,如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等,也将中国学者的成果推向了世界,。

如今,中国学者的视野愈加开阔,越来越多的国际期刊和出版社开始认可中国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期刊和出版社也将中国的成果不断地推向世界,中国法经济学的国际发表数量会越来越多,中国法经济学的国际化是一股潮流也是趋势。与此同时,应该认识到,法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不应是为了迎合国际期刊发表标准,而对量化实证研究的简单趋同。中国学者应立足中国当下的问题,提高方法论运用的严谨性,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在批评与学习中提升自己。

(二)对中国法经济学未来的思考

从“取经”到“模仿”,再到“本土化”、“国际化”,中国法经济学研究人才越来越多,^②研究成果数量及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均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前路漫漫,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方面,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法经济学理论在对中国问题的解释中,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虚拟世界的发展使得当今经济世界的运行机制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传统的经济学、法学理论的解释力也正在不断下降。

未来的中国法经济学至少应当对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关注:

第一,大数据推动下的实证分析。大数据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在其推动下的实证研究已经在趋势预测、主体决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在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时候要注意大数据自身的特点与缺陷。法经济学的研究在运用大数据的同时,也要注意运用“小”数据;此外,在进行任何数据分析的同时,都不能忽视理性的思考,而应力图促进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第二,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有关的权利边界问题。互联网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了信息化的智能时代。日趋扁平化、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结构,对传统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但挑战也是机遇,与之有关的权利边界问题正是法经济学分析可以大施拳脚的领域。

第三,司法改革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司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的司法改革对司法体制进行了重大改变,势必会将反映到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上。司法改革的效果以及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影响值得关注,也将成为法经济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实践。

第四,实证、量化分析的缺陷及克服。计量分析方法一直被人诟病的原因在于,它可能遗漏了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统计数据也可能不可靠。以裁判文书的计量分析为例,虽然基于诉讼判决的实证

① 囿于能力和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列出所有的在国外发表的法经济学成果数量,只梳理了近在中国的学者发表在顶级法经济学期刊上的成果,还有许多国外工作的华裔学者或国外在读博士的优秀成果出现在法学或经济学期刊上。《China Economic Review》等关注中国问题的国际期刊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研究的国际化。

② 近些年,中国的法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参考黄立君:中国法经济学发展概览,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分析越来越多,得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裁决本身涉及的案件样本可能只是社会纠纷中极少的一部分,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所以,法经济学的研究要特别注意防止量化分析的泛化,在运用上一定要严谨,并尽可能完善量化方法,减少技术层面的干扰。

第五,在分析法律对经济行为、经济活动规律的影响时,也要注意多维度考虑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建构中国法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时,要注意“特殊性”和“普适性”的结合。法经济学的本土化,或者说中国法经济学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或处处凸显与西方理论的不同。中国的法经济学发展可以、也应当对法经济学整个学科有所贡献。

正如法经济学一位重要的奠基人——卡拉布雷西所说,“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比中国更加重要。中国法律和中国经济系统的发展将影响法和经济学在全球发展的趋势。在这个重要意义上,中国就是未来。”^①当下的中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为中国法经济学者甚至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契机。中国法经济学的未来,应当立足于中国的本土之上,同时关注全世界人类发展的一般性、普适性问题,这样才能产生不仅能够推动中国发展,而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Cooter R., 2011, “Maturing into Normal Science: The Effect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on Law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5:1475-1484.
- [2] Jolls C., C. R. Sunstein and R. Thaler, 1998,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50 *Stan L Rev* 1471, 1541.
- [3] Long C. X., 2010, “Does the Rights Hypothesis Apply to China?,”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3(4):629-650.
- [4] Long C. X. and J. Wang, 2015, “Judicial Local Protectionism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IP Cas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42: 48-59.
- [5] Lin Y. and Y. Chang, 2017, “Does Mandating Cumulative Voting Weake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52: 111-123.
- [6] Liu Z., 2018, “Does Reason Writing Reduce Decision Bia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Judges in China,”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7(1): 83-118.
- [7] Pistor K. and C. Xu, 2005, “Governing Stock Marke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Lessons from China,”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7(1): 184-210.
- [8] Posner R. A. and G. Becker, 2014, “The Future of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0(3): 235-240.
- [9] 艾佳慧, 2007, “‘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 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外法学》,第5期,第534-551页。
- [10] 艾佳慧, 2013, “科斯与波斯纳:道不同,不相为谋?”,《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2卷,第227-246页。
- [11] 艾佳慧, 2006, “司法知识与法官流动——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第4期,第95-112页。
- [12] 艾佳慧, 2017, “制度环境、诉讼策略与民事上诉率变迁——理论模型与初步检验”,《法制与社会发展》,第5期,第53-73页。
- [13] 白建军, 2006, “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135-145页。
- [14] 白建军, 2010, “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144-159页。
- [15] 白建军, 2016, “基于法官集体经验的量刑预测研究”,《法学研究》,第6期,第140-154页。
- [16] 白建军, 2017, “中国民众刑法偏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143-163+207-208页。
- [17] 鲍金红, 2015, “西方经济学家视角下科斯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关系”,《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4)》,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 [18] 曹正汉, 2003, “相同文化背景下制度演进分歧的原因——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个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制度经济学筹委会,中国制度经济学会论文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制度经济学筹委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 [19] 常延龙, 龙小宁, 孟磊, 2019, “异地审理、司法独立性与法官裁决——基于广东省江门市司法制度改革的实证研

① [美]圭多·卡拉布雷西:法和经济学的未来,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封底。

- 究”,《经济学(季刊)》,即将出版。
- [20] 陈岱孙,1983,“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3-6页。
- [21] 陈刚、李树、陈屹立,2009,“人口流动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52-61+111-112页。
- [22] 陈刚、李树,2013,“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以法官异地交流为实验的研究”,《经济研究》,第9期,第30-42+70页。
- [23] 陈屹立,2008,“中国犯罪率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
- [24] 陈屹立,2012,“严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第2期,第87-95页。
- [25] 程金华,2018,“迈向科学的法律实证研究”,《清华法学》,第4期,第149-166页。
- [26] 褚红丽、孙圣民、魏建,2018,“职务级别、法律制度设计与腐败惩罚扭曲”,《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873-896页。
- [27] 褚红丽、魏建,2016,“腐败惩罚的边际递减及地区差异:基于腐败金额的实证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第3期,第102-112页。
- [28] 褚红丽、魏建,2018,“刑期与财产双重约束下的腐败惩罚——2015年刑法修改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第73-83页。
- [29] 董雪兵、朱慧,2004,“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与专利保护的比较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第3期,第54-63页。
- [30] 冯玉军、方鹏,2012,“《劳动合同法》的不足与完善——《劳动合同法》在中小企业适用的法经济学分析”,《法学杂志》,第2期,第24-32页。
- [31] 冯玉军,1998,“《兰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的成本效益分析”,《发展》,第8期,第35-37页。
- [32] 冯玉军,2004,“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法制与社会发展》,第1期,第31-45页。
- [33] 冯玉军,2001,“法律的交易成本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第6期,第10-16页。
- [34] 冯玉军,2014,“论当代美国法经济学的理论流派——以学术传统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第52-61页。
- [35] 冯玉军,2007,“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中国法学》,第4期,第39-59页。
- [36] 冯玉军,2017,“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评估”,《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138-159+208页。
- [37] 顾培东,1992,“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兼评西方法律经济学”,《中国法学》,第1期,第89-98页。
- [38] 何家弘、何然,2008,“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政法论坛》,第2期,第3-19页。
- [39] 黄辉,2015,“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正当性:基于债权人保护功能的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法学》,第6期,第159-178页。
- [40] 黄立君,2018,“中国法经济学发展概览”,《山东社会科学》,第10期,第151-156页。
- [41] 黄立君、杨芳,2011,“3Q之争:监管失灵与法律缺失情境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广东商学院学报》,第5期,第75-81页。
- [42] 黄少安、陈斌开、刘姿彤,2012,“‘租税替代’、财政收入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经济研究》,第8期,第93-106+160页。
- [43] 黄少安、宫明波,2002,“价格听证会的效率分析——以中国首次铁路客运价格听证会为例”,《消费经济》,第4期,第55-57+28页。
- [44] 黄少安、刘明宇,2008,“农地产权冲突、经济绩效与土地制度创新差异化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与经济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第4期,第3-11页。
- [45] 黄少安、王安,2010,“对拾遗者定罪及其权利主张的法经济学分析”,《学术月刊》,第11期,第78-84页。
- [46] 黄少安、阎晓莹,2018,“供需双方信息不完全、交易费用差异与火车票市场扭曲——对“倒票”行为的交易费用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8期,第34-50页。
- [47] 黄少安,1996,“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缺陷分析(上)”,《学习与探索》,第4期,第4-10页。
- [48] 黄少安,1996,“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缺陷分析(下)”,《学习与探索》,第5期,第20-26页。
- [49] 黄韬,2012,“为什么法院不那么重要——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观察”,《法律和社会科学》,第63-110页。
- [50] 黄文平,2007,“法制转型、不平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1952-2003中国法院诉讼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第4期,第32-40+125页。
- [51] 江平,2004,“经济学的法律眼镜”,《法人》,第5期,第125页。
- [52] 蒋兆康、田培炎,1992,“作为一种法哲学的法律经济学——它的历史、基础和方法”,《中外法学》,第1期,第43-48+29页。

- [53] 李睿鉴、陈若英,2012,“对私募投资中“对赌协议”的法经济学思考——兼评我国首例司法判决”,《广东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第82-90页。
- [54] 李胜兰、冯玉军,1996,“法律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兰州学刊》,第3期,第48-51+43页。
- [55] 李胜兰,2011,“中国民营企业治理与法律和社会资本互动机制研究”,《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编辑部,2011年(第九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 [56] 李树,2008,“行为法经济学的勃兴与法经济学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第76-82页。
- [57] 李长健、蒋诗媛、陈志科,2008,“基于利益视角的小产权房中的博弈问题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50-56页。
- [58] 李振宇、黄少安,2002,“制度失灵与技术创新——农民焚烧秸秆的经济学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第11-16+80页。
- [59] 刘大洪,1998,“反垄断法的法经济学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36-41页。
- [60] 刘大洪,1999,“论经济法成本”,《经济评论》,第3期,第12-14页。
- [61] 龙小宁、王俊,2014,“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基于知识产权案例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第3-18页。
- [62] 龙小宁、黄小勇,2016,“公平竞争与投资增长”,《经济研究》,第7期,第147-157页。
- [63] 龙小宁、王俊,2016,“法治与改革——基于中国法院系统的历史与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第205-214页。
- [64] 龙小宁、易巍、林志帆,2018,“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有多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8期,第124-140页。
- [65] 龙小宁、林菡馨,2018,“专利执行保险的创新激励效应”,《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116-135页。
- [66] 卢建平、苗淼,1997,“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刑罚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第2期,第33-39页。
- [67] 苗妙、魏建,2014,“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偏好与企业创新激励——基于转型期“大调解”机制政策效果的分析”,《产业经济研究》,第6期,第102-110页。
- [68] [美]圭多·卡拉布雷西、郑戈译,2019,《法和经济学的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69] 倪继信、任祖耀,1983,“法经济学研究对象初探”,《现代法学》,第3期,第13-15页。
- [70] 宁静波,2013,“法官与法院的产出效率:问题与对策——基于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16-126页。
- [71] 潘越、潘健平、戴亦一,2016,“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金融研究》,第8期,第191-206页。
- [72] 钱弘道,2002,“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法学研究》,第4期,第3-17页。
- [73] 钱弘道,2003,“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分析”,《政法论坛》,第4期,第143-150页。
- [74] 冉昊,2016,“反思财产法制建设中的“事前研究”方法”,《法学研究》,第2期,第79-97页。
- [75] 桑本谦,2003,“从经济学视角看非法获得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第63-65页。
- [76] 桑本谦,2006,“民间的社会保障——对山东农村互助合作规范的经济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9-13页。
- [77] 桑本谦,2007,“法律控制的成本分析——以对通奸和黄色短信的法律控制为例”,《现代法学》,第5期,16-26页。
- [78] 桑本谦,2008,“疑案判决的经济学原则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108-122+207页。
- [79] 桑本谦,2014,“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赠与承诺——重解《合同法》第186条”,《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第51-58页。
- [80] 沈满洪,2004,“区域水权的初始分配——以黑河流域“均水制”为例”,《制度经济学研究》,第3期,第64-80页。
- [81] 沈满洪,2006,“水权交易与政府创新——以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案为例”,《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645-690页。
- [82] 沈满洪,2005,“水权交易与政府创新——以东阳义乌水权交易案为例”,《管理世界》,第6期,第45-56页。
- [83] 沈宗灵,1990,“论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中国法学》,第3期,第53-64页。
- [84] 史晋川、汪晓辉、吴晓露,2015,“产品侵权下的法律制度与声誉成本权衡——一个微观模型补充”,《经济研究》,第9期,第156-169页。
- [85] 史晋川、汪晓辉、吴晓露,2014,“缺陷监管下的最低质量标准与食品安全——基于垂直差异理论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第43-56页。
- [86] 史晋川、吴晓露,2002,“产品责任制度建立的经济学分析——对“三菱帕杰罗事件”的思考”,《经济研究》,第4

- 期,第60-67+91-95页。
- [87] 史晋川、吴晓露,2016,“法经济学:法学和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发展”,《财经研究》,第10期,第50-79页。
- [88] 史晋川、吴兴杰,2010,“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73-84页。
- [89] 史晋川、姚如青,2006,“所有权与先占行为的挂钩和脱钩——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案例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第4期,第35-50页。
- [90] 史晋川,2001,“法律经济学:回顾与展望”,《浙江社会科学》,第2期,第53-57页。
- [91] 史晋川,1996,“计算机软件盗窃案中厂商收益损失确定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第74-80页。
- [92] 苏力,2006,“‘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116-132+205页。
- [93] 唐清利、何真,2016,“公私权模糊领域社会治理的理论与路径——基于日常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管理世界》,第12期,第102-115页。
- [94] 田燕梅、魏建、白彩全,2018,“原告诉求金额影响法院判决金额吗——基于著作权一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第96-108页。
- [95] 王安、魏建,2012,“法律执行与道路交通事故——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效果的评价”,《浙江学刊》,第1期,第130-137页。
- [96] 王传丽,1999,“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第6期,第93-104页。
- [97] 王俊,龙小宁,2016,“版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吗——来自德化陶瓷企业的证据”,《经济学动态》,第6期,第26-36页。
- [98] 王俊峰,2014,“美容院强迫顾客高额消费行为的定性”,西南政法大学。
- [99] 王雷、万迪昉、贾明、张喆,2007,“司法者激励对司法公正影响的模型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6期,第79-87+125页。
- [100] 王圣学,1983,“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101-112页。
- [101] 王育才,1994,“法律经济学初探”,《法学研究》,第5期,第10-17页。
- [102] 魏建、彭康、田燕梅,2019,“版权弱司法保护的经济分析——理论解释和实证证据”,《中国经济问题》,第1期,第124-136页。
- [103] 魏建、彭涛,2008,“财产的最佳利用与遗失物制度的法律选择——遗失物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第33-39页。
- [104] 魏建、宋微,2008,“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选择——产权保护理论的法经济学进展”,《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5期,第133-139+160页。
- [105] 魏建,2001,“当代西方法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研究”,西北大学。
- [106] 谢晓尧、黄胜英,2001,“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分析”,《学术研究》第8期,第73-79页。
- [107] 谢宇,2018,“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1-13+242页。
- [108] 阎云峰,2008,“法律经济学的历史、现状和展望”,《现代经济探讨》,第6期,第89-92页。
- [109] 姚子范,1981,“制度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与宏观、微观经济学的比较”,《教学与研究》,第1期,第49-53页。
- [110] 叶卫平,2017,“产业重组与反垄断法实施”,《法治社会》,第6期,第1-8页。
- [111] 易宪容,1996,“法经济学的思想轨迹与当前发展”,《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第56-60页。
- [112] 殷继国,2010,“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本土化探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54-58页。
- [113] 应飞虎,2004,“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思考——基于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视角”,《中国法学》,第6期,第116-124页。
- [114] 于立、冯博,2012,“最高人民法院首个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跳单案”案例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第25-31页。
- [115] 余淼杰、崔晓敏、张睿,2016,“司法质量、不完全契约与贸易产品质量”,《金融研究》,第12期,第1-16页。
- [116] 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2013,“民营化、产权保护与企业风险承担”,《经济研究》,第9期,第112-124页。
- [117] 郁光华,1994,“法律的经济分析——现代北美法学流派之一”,《法学评论》,第5期,第63-66页。
- [118] 张广辉,2012,“政府、开发商、农民与耕地违法:理论假说与经验证据”,《2012年度(第十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经济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 [119] 张建伟,2000,“新法律经济学:理论流派与反思性评论”,《财经研究》,第3期,第3-9页。

- [120] 张乃根,1992,“论法—经济学研究”,《法学》,第9期,3-7页。
- [121] 张守文,1992,“经济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法学研究》,第5期,第27-33页。
- [122] 张维迎、柯荣住,2002,“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以契约纠纷的基层法院判决书为例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31-43+205-206页。
- [123] 张维迎,2002,“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第1期,第3-13+92-93页。
- [124] 张维迎、邓峰,2003,“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99-112+207页。
- [125] 张文显、马新福,1986,“关于改革我国理论法学的初步设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第24-27页。
- [126] 张永健,2019,“量化法律实证研究的因果革命”,《中国法律评论》,第2期,第135-141页。
- [127] 张永健,2018,“程金华法律实证研究的方法坐标”,《中国法律评论》,第6期,第90-106页。
- [128] 赵凤梅、李军,2008,“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历史性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80-85页。
- [129] 赵和旭,1990,“当代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原理简述”,《江淮论坛》,第6期,第49-50+62页。
- [130] 种明钊、顾培东,1985,“西方法经济学评介”,《现代法学》,第1期,第92-94页。
- [131] 种明钊,1983,“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现代法学》,第2期,第15-18页。
- [132] 周林彬,1995,“市场经济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国法学》,第1期,第21-28页。
- [133] 周林彬、黄健梅,2004,“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学术研究》,第12期,第63-72页。
- [134] 周林彬、王佩佩,2008,“试论商事惯例的司法适用——一个经济法学的视角”,《学术研究》,第10期,第66-72+159页。
- [135] 周林彬、马恩斯,2018,“数据财产归属的反思——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模型”,《制度经济学研究》,第4期,第1-16页。
- [136] 周林彬、王睿,2018,“法律与经济发展“中国经验”的再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19-28页。
- [137] 朱慧、史晋川,2001,“版权保护悖论的经济学分析”,《浙江社会科学》,第6期,第17-21页。
- [138] 朱力宇,1991,“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第103-111页。
- [139] 朱宪辰、章平,2005,“业主自治的可能性:基于复制动态的合作均衡条件”,《制度经济学研究》,第3期,第132-152页。
- [140] 朱宪辰、高岳,2007,“法律变迁的“主观知识”解释——以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例的立法逻辑矛盾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第3期,第56-71页。
- [141] 邹川宁、王雷,2008,“审判组织治理的实证研究”,《人民司法》,第1期,第44-49页。
- [142] 左卫民,2005,“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第4期,第122-132页。
- [143] 左卫民,2017,“中国法律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

Law and Economics in China: Introduction and Localization

WEI Jian¹, NING Jingbo²

1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2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Abstract: Law and econom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combining economics with law. Modern research in law and economics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The concept of law and economic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1980s. Since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and economics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ntroduction and localization. Law circle and economics circle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stages. With the common concern with localization issue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law and economics in China have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b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pproach, and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analytical paradigm. Finally, China's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shows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ch has exerted an increasingly more important impact on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 the world.

Key Words: Law and economics; Localiz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龙小宁][校对:李娜]